

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论

QINGGUO XINSHI LILUN PIPENG SHILUN

杨四平 著

诗学谱系的现代转型

纠缠于新的审美原则的合法性

历史合力促成的现代性

从偏至到综合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

政治革命对思想异质化的排除

政治-文化革命对思想同质化的实现

新启蒙精神鼓舞下的断裂与倾斜

疏离后新人本主义的焦虑

喜剧氛围下的差异与生成

安徽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 何焕生
装帧设计 何宇清

ISBN 978-7-5336-4922-7



9 787533 649227 >

定价：29.80 元

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论

ZHONGGUO XINSHI LILUN PIPING SHILUN

杨四平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论 / 杨四平著. —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8. 3

ISBN 978-7-5336-4922-7

I. 中… II. 杨… III. 新诗—文学批评史—中国 IV. I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29527号

责任编辑:何焕生

装帧设计:何宇清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398号

邮 编:230601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

开 本:650mm×960mm 1/16

印 张:21

字 数:280 000

版 次:2008年3月第1版 200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2 000

定 价:29.80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电 话:(0551)3683078

题

辞

向存在的大地说：我流，
向流动的大海说：我在。

——里尔克《献给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

目 录


MULU

- 绪 论 流动的现代性/1
- 第一章 诗学谱系的现代转型/11
 - 第一节 诗文革新/13
 - 第二节 诗界革命/15
 - 第三节 由古典向现代过渡的关节点/21
 - 第四节 表层的政治性与深层的工具性/30
- 第二章 纠缠于新的审美原则的合法性/32
 - 第一节 为新诗合法性而争斗/32
 - 第二节 为新诗主流走向而论辩/37
 - 第三节 为新诗美学原则而审思/43
- 第三章 历史合力促成的现代性/47
 - 第一节 力倡“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47
 - 第二节 纯诗论的洋场狐步舞/52
 - 第三节 无产阶级诗论的左冲右突/55
 - 第四节 前卫诗论的纵横编织/57
- 第四章 从偏至到综合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67
 - 第一节 激进型现实主义诗论摇旗呐喊/68
 - 第二节 传统型现实主义诗论沉稳掘进/75
 - 第三节 体验型现实主义诗论在夹缝中生长/80
 - 第四节 现代主义诗论从偏至走向综合/84
- 第五章 政治革命对思想异质化的排除/88
 - 第一节 党和国家对诗人、诗评家的管理/88

- 第二节 公共传播空间的拓展/90
- 第三节 健康的舆论引导/92
- 第四节 政治权力的恶性运作/97
- 第五节 新诗民族话语的重构/112
- 第六章 政治—文化革命对思想同质化的实现/122**
 - 第一节 迷津里的博弈/123
 - 第二节 渐入同质化/130
 - 第三节 “拨乱反正”举步维艰/136
 - 第四节 新诗要现代化/139
 - 第五节 台湾新诗理论批评进一步现代化/145
- 第七章 新启蒙精神鼓舞下的新裂与倾斜/150**
 - 第一节 破除新诗现代化的坚冰/150
 - 第二节 朦胧诗论的崛起及其论争/174
 - 第三节 镜像写作中的“第三代”诗论/194
 - 第四节 纷争外的诗艺盛宴/225
- 第八章 疏离后新人本主义的焦虑/244**
 - 第一节 由“共名”向“无名”的语境转换/246
 - 第二节 “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争/253
 - 第三节 先锋成了“问题”/261
 - 第四节 书写新诗史的努力/267
 - 第五节 对新诗本体的探讨/279
- 第九章 喜剧氛围下的差异与生成/285**
 - 第一节 新一轮“新文化运动”的冲击/288
 - 第二节 文学权力场上的突围与表演/294
 - 第三节 诗歌写作的伦理困境/303
 - 第四节 “代际写作”的伸展性/310
- 结 语 解不开的新诗“斯芬克司之谜”/319**

绪 论

流动的 现代性



我们可以用“流动的
现代性”概括百年新诗理论批评的总体特征，因为在新诗理论批评的现代性追寻中，“时间也就获得了历史”^①；而且，“制度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是交迭着朝前发展的。

晚清诗歌理论批评经历了从前期旧式的“诗文革新”到后期新式的“诗界革命”^②。龚自珍和魏源发动的“诗文革新”，强调诗歌的现实性、真实性、独创性和“经世致用”优先的原则，重构“志”、“道”与“经”之间的一体性关系，为“诗界革命”提供了原则性的基础。而“诗界革命”的发生，主要取决于国内的改良运动，传统诗歌内在规律的流变和日本启蒙诗歌运动的影响。黄遵宪从社会演变和语言变革入手革新诗歌，树

① 奇格蒙特·鲍曼：《流动的
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3页。

② 饮冰（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载《新民丛报》，1903年4月11日第29号。

起“我手写我口”^①的旗帜，提倡创作“新派诗”^②。而梁启超则直接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主张用西方高级思想来启发中国民众，从而在改革派知识精英与市民阶层之间架起了一座普及的桥梁。“诗界革命”显露出政治化“文学革命”的双重面相，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先导。

20年代，中国新诗理论批评有早期的“文白之争”，中期的“为人生”诗派与“为艺术”诗派之争和后期的普罗诗派与新月诗派、象征诗派之争，派中有派、流中有流，且节外生枝、旁枝侧出。质言之，从为新诗的合法性而斗争，到为新诗的主流走向而论辩，再到为确立新诗的美学原则而审思，20年代新诗理论批评走了一条由外而内，越来越沉着稳健的发展道路。

30年代，中国新诗理论批评极为繁复。以“《新诗歌》派”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诗论与以“《现代》诗派”为代表的走向综合的“纯诗”诗论之间的论争呈现出主流风貌，是“火的呐喊与梦的呢喃”^③；而且，其支流很庞杂，也很前卫，主要有印象主义诗歌理论批评、现代解诗学、心理原型诗歌批评、“新批评”诗歌理论批评和新诗史研究等。它们的合力使得新诗理论批评走向深入。同时，在接受前苏联和西方现代文学理论观念和创作方法上，比起20年代来，30年代新诗理论批评涉及面更广、力度更大，自觉意识更强。因此，30年代新诗理论批评的现代性表现得相当充分。

40年代，现实主义诗论和现代主义诗论二分天下，都有“激进型”、“传统型”和“综合型”三种。在现实主义诗论方面，“激进型”诗论主要

① 黄遵宪：《杂感》（五首）之第二首，见《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钱仲联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2页。

② 黄遵宪：《酬曾重伯编修并示兰史》，载《新民丛报》，1904年第4号。“废君一月官书力，读我连篇新派诗。风雅不亡由善作，光丰之后益矜奇。”

③ 张同道：《火的呐喊与梦的呢喃——三十年代的左翼诗潮与现代主义诗潮》，载《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

围绕朗诵诗、街头诗、方言诗、叙事诗、新诗的民族形式、现代政治讽刺诗和“九叶派”等问题展开论争，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了“旧错误和新偏向”。实质上，它们都着眼于新诗大众化以及如何更好地为现实斗争与救亡图存服务。“传统型”诗论则潜心于对新诗现实主义精神与艺术规律的探讨，而“综合型”诗论则强调创作主体与创作客体之间相生相克，它们共同推进了40年代现实主义诗论的发展和深化。总体看来，“激进的现实主义”诗论声势很大，“传统的现实主义”诗论姿态沉稳，而“体验的现实主义”诗论魅力极强。它们之间的矛盾与纷争反映出40年代现实主义诗论大众化诉求的限度与难度。在现代主义诗论方面，“综合型”诗论超越了“激进型”诗论之狭隘和“传统型”诗论之保守，以海纳百川的开放姿态吸纳了“体验的现实主义”诗论，使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在40年代末克服了40年代初的偏至，走上了综合的现代性诗艺探寻之途。在40年代新诗理论批评的总体格局中，现实主义诗论“人多势众”，在力量与影响上，始终占上风，为建国后文艺进一步走向“浮夸”的现实主义埋下了伏笔。

“新诗歌”是50—60年代特指当代中国诗歌的政治性概念，其目的是要同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现代中国诗歌区分开来。从50年代初党对知识分子前后不同的态度，诗歌理论批评公共传播空间的拓展，到1955年前诗歌理论批评健康的舆论引导，再到1955年后政治权力的恶性运作，最后到新诗民族性话语的重构，这一切都是在国家诗歌意识操控下的排斥、融合与重铸。新诗民族性追求超过了现代性追寻，成为最高的律令，为随后新诗走向一体化、同质化做好了铺垫。

经由50年代几乎是全民参与的“毛泽东文艺方向”一体化的革命努力，60—7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为了加快推进现代化，在原本一体化程度极强的基础上，全力以赴地紧抓同质化，竭力将思想文化领域里异质化的东西彻底清除掉，最终导致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

前,新诗理论批评方向不明,诗评家们定性不足。但是,总体上他们还是在为“新民歌”大唱赞歌,只有少数评论家“不识时务”地唱“反调”。“文革”时期,新诗理论批评发展分前后两段。以1972年为界,之前的六年,可以说是新诗理论批评史上绝无仅有的荒芜期;之后,新诗理论批评得到了有限度的恢复,仿佛是1963—1966年新诗理论批评的“回光返照”,这期间所有的诗歌理论批评都在号召新诗向样板戏学习。1977—1978年,新诗理论批评开始了举步维艰的“拨乱反正”,主要用批判的方法来批判所要批判的对象,在心态、手法、逻辑、形式上与“文革”的狂乱并无二致。阶级斗争依然像阴魂那样在人们精神的天空飘荡。这两年新诗理论批评的阶级斗争味很浓。诗评家们一边在清算江青集团的“阴谋诗歌”及其“阴谋诗论”,一边在讴歌在当时看来属于正面的诗歌——那种真正革命意义上的诗歌。新诗理论批评开始出现了由同质化向多样化转变的征兆。1979年是新诗理论批评从“拨乱反正”走向思想解放的过渡年份。“新诗要现代化”成为当年最响亮、最鼓舞人心的口号。概言之,60—70年代的新诗理论批评,不仅仅是一场艺术革命,同时也是一场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经由“阳谋文艺”到“阴谋文艺”,使“政治正确性”绝对等同于“诗歌正确性”,从整体上否定新诗的真正目的在于要提出新的美学标准和文化理想。与此同时,台湾新诗理论批评在50年代开始了现代化进程,与大陆推进民族化、大众化呈现出不同的流向。这种反差在60—70年代表现得尤为突出——大陆是越来越一体化、同质化,而台湾是越来越多样化、世界化。具言之,50年代台湾新诗理论批评主要是倡导如何建构崭新的民族的汉诗,即如何更好地促进新诗的再革命;到了60—70年代,台湾新诗理论批评抱负更大、境界更高,即在探求如何使现代汉诗世界化;直到80年代,大陆新诗理论批评才在现代化追寻的道路上与台湾新诗理论批评“并轨”了。

80年代新诗理论批评,首先,从“着眼全局,共谋发展”和“拨乱反正

的余绪,极左思潮残存的影响”两方面来“破除新诗现代化的坚冰”。从前者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的现代主义”的诗歌现代化发展问题以及围绕新时期新诗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诸种问题和由此引发的论争,还有关注并扶持青年诗人的成长问题;从后者可以看到“重评《草木篇》之类的寓言诗、讽刺诗”和围绕政治抒情诗展开的论争。其次,可以从诗学触媒,论争的出场、演进和余绪等方面较为详尽地看到“朦胧诗”诗论的崛起及其引发的论争。再次,从“第三代”诗歌及其诗论的传播空间的生成、语义空间的建构、历史形象的呈现和20年后的再次集结以及发表的共同宣言四个方面,看到“第三代”诗论的星光灿烂。最后,是纷争之外的诗艺探索,如各类新诗“普及读本”的出版、新诗发展史研究、西部诗歌和女性诗歌等新诗热点问题研究;又如,新诗文体美学、新诗技巧、新诗资源等方面的丰富景观。此外,还有80年代台港新诗理论批评的健康成长。总之,无论是格局上还是纵深度上,乃至横向拓展方面,80年代新诗理论批评都是历史上最繁荣、最丰富的时期。

90年代新诗理论批评表现为诸种“疏离之后的抉择”^①。进入90年代,新启蒙主义思潮历史性地终结了,新人本主义的“非理性”凸现出来,致使“新理性”成为它内在的需求。不少人认为90年代具有80年代所缺乏的新质。“中断说”比“断裂说”具有代表性。90年代诗论的写作、传播、阅读和消费方式都发生了巨变,与公开出版的诗刊同时并存的有“亚文化”性质的“民刊”以及无数具有狂欢心态的诗歌网站与诗人主页。90年代诗论“从边缘出发”,其最为明显的变化是使通向“此在”的“个人写作”得以真正确立。我们可以从民族语言的表意策略、资源背景、历史意识、总体格局、大体走向、“后口语”和“叙述”等方面看到90年代诗论的新变。90年代诗论的焦虑主要通过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

^① 叶梅:《疏离之后的抉择》,载《诗歌报》,1995年第3期。

与“民间写作”之争表现出来。他们围绕“民间(立场)”、“知识/知识分子(立场)”、“与西方接轨”、“硬与软”等“欧化”或“化欧”之类的核心问题展开论争。其实,双方并无真正的矛盾,它们之间只有诗歌理念上的不同,它们之间是相通的、互补的。“知识分子写作”强调中国经验、中国话语场、本土气质、日常经验,叙事性、叙述性、及物性、技巧性和综合性;而“民间写作”始终在为“民间立场”和“口语写作”在90年代的合法性存在据理力争,其西方知识背景是胡塞尔的现象学、索绪尔的语言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但更多的是受到了西方后现代主义中的解构主义、第三世界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的影响。由于90年代先锋诗歌越来越表现出“个人趣味化”,越来越晦涩难懂,导致了阅读的障碍与批评的缺席。所以,90年代的新诗理论批评有很大一部分是由诗人自己写作的“诗人评论”。除了诗学论争外,90年代新诗理论批评还有多方面的收获。第一,对90年代的“先锋”进行了冷静而理智的反思。“困局论”,“危机论”,“终结论”,“陷阱或迷宫”说,“病象”说,“并非先锋”说等富有代表性。当然,也有不少诗评家在为“先锋”鼓劲加油,“中华性”的崛起和“人文理性”的跨世纪诗学建构是其代表。总之,反思到最后,先锋的问题似乎变成了后现代性的问题。有人认为这种“喜剧狂欢”理论是导致诗歌精神溃散的罪魁祸首,所以,必须“重建诗歌精神”。第二,“重写新诗史”的倾向。有人从百年新诗发展的历程进行描述,有人则从新诗流派演变的角度去透视。这既有百年新诗流派史的研究,又有就新诗流派里的某一主要流派进行细致梳理,其中,对现代主义诗歌流派研究得最充分。此外,“诗人评论”也是一大亮点。90年代台湾新诗史的研究也是构成新诗理论批评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两岸关系“解冻”后,对“大陆的台湾诗学”进行检讨成为90年代台湾新诗理论批评的一个热点。他们一方面为大陆的台湾诗歌研究指谬、纠偏,一方面也从自身梳理与自我建构出发积极主动地开展台湾诗歌史的研究工作。香港

新诗理论批评界也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撰写“香港新诗史”的热情,不少文章从“断代”的角度研究香港新诗的发展历程,但是一直没有形成气候。第三,对新诗教育的关注,对网络诗歌、民间诗歌和“70后”写作的最初兴趣,对其“合法性”地位的确立,也有人撰写论文。但是,这些话题直到21世纪初才得以展开。第四,新诗文体研究也成绩斐然,呈扇形展开,其中,“十四行体”的研究成果明显。第五,以“开放式的本文细读”和“有限度的审美接受”为轴心的“中国现代解诗学”也扎实深入。第六,对新诗理论批评的“再批评”,是90年代新诗理论批评走向深入的又一重要表现。“断代”研究与区域研究是其主体。一言以蔽之,90年代诗歌理论批评力避本质化、历史化那些整体性话语,而表现出多样化及其复杂性。

20世纪与21世纪之间的过渡与交接是在“世纪转型”这一百年一遇的“影响的焦虑”中进行的。也许是相信“人性恶论”^①以及恶与欲望是历史前进杠杆的说法^②,世纪之交的新诗理论批评以言辞与情绪都很激烈的“批判书”鸣锣开道^③。21世纪初始,一批青年人打出了“下半身写作”的旗号,以“诗歌从肉体开始,到肉体为止”^④作为传播学与美学策

①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8—29页。“人性本恶这一基督教的教义,比其他教义说人性本善要高明些,因此,应该依据这一教义的哲学上解释来把握它。人作为精神是一种自由的本质,具有不受自然冲动所规定的地位。所以,处于直接的无教养的状态中的人,是处于其所不应处的状态中,而且必须从这种状态解放出来。原罪说就具有这种意义,否则基督教就不成其为自由的宗教了。”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3页。恩格斯说:“黑格尔指出:‘人们以为,当人们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另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恩格斯说:“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与权势欲,构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

③ 参见伊沙等:《十诗人批判书》,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④ 参见沈浩波:《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见《2000中国新诗年鉴》,杨克主编,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546页。

略来宣扬他们的文学“真实观”，其潜在意旨是最终要把一个“肉体”问题提升、转化为一个关乎个体与人类生存的“抉择”问题，多少显露了生命哲学的意向^①。但是，也有人说它“把流氓耍成一种流派”^②。21世纪初，新诗理论批评的境况是新诗在开始“回温”。尽管这里面不排除某些急功近利的因素在暗地里操作，但毕竟“诗，由流落到宠幸”^③。21世纪初，对新诗发展开始了新一轮的反思和梳理，各种新诗史、新诗选本以及新的诗歌命题纷纷登上了新世纪的大舞台。诗歌批评界围绕新诗史“如何写”和“写什么”展开了讨论。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情况下，21世纪初新诗理论批评表现为一种崭新的“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在这股强势力量的推动下，形成了21世纪初特有的诗歌格局及走向，那就是：一、回归传统精神和乡土文明；二、追寻“后现代”的“后口语写作”；三、体味中西文化之间的激烈震荡。21世纪初诗歌内里均匮乏“历史想象力”，并表现出伦理缺失的倾向^④。有人错误地把其原因简单地归咎于诗歌市场化的纠缠；也有人以“底层生存写作”的“写作伦理”去揭批当下诗歌写作里到处充斥着所谓“中产阶级趣味”^⑤；也有人反唇相讥地指责这是传统诗评常见的“道德归罪与阶级符咒”的借尸还魂^⑥。我们必须同时警惕在新诗批评领域里可能出现的“泛伦理化”和“去伦理化”的两种错误倾向。此外，60年代出生的“中间代”集体出场，也是21世纪初诗歌史情结焦虑中的整体突围，是对文学史权力场的主动出击与

① 参见杂渔：《我现在考虑的“下半身”——并非对某些批评的回应》，见《2000中国新诗年鉴》，杨克主编，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

② 参见韩寒：《坚决支持诗人把流氓耍成一种流派》，参见韩寒博客。

③ 参见徐敬亚：《诗，由流落到宠幸——新世纪的“诗歌回家”（一）》，载《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④ 参见杨四平：《简谈新世纪诗歌的“伦理困境”》，载《光明日报》，2007年12月23日“理论综合版”。

⑤ 参见张清华：《关于现今写作中的中产阶级趣味问题》，载《星星诗刊》，2006年第2期。

⑥ 参见钱文亮：《道德归罪与阶级符咒：反思近年来的诗歌批评》，载《江汉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撼动。还有，“70后”与“80后”伸展的可能性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诗学话题。它必将拓展未来新诗理论批评的新时空。

概言之，从晚清到21世纪初，随着历史文化语境的变迁，人们对新诗的认识和看法是不断变化的；它们相互之间也不尽相同，有时候差异还特别大。那么，新诗到底有无自己的原点、边界和场域？如果有，那么又是什么？虽然至今还没有形成共识，但是有一些观点是毋庸置疑的，比如，新诗在话语方式和内在结构上有别于散文，新诗的现代性在于它不断为自己创造未来。因此，我们应该从历史文化和审美特性方面着手去解决新诗在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同时，我们不难看出新诗变革是新诗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长期以来，诗界、学界对新诗革命的认识相当混乱。“一次革命论”、“二次革命论”，既遮蔽了人们对新诗脉络的把握，又不利于新诗自身的发展和文学观念的演进。其实，新诗史上发生过三次重大革命。20世纪初的第一次新诗革命，确立了新诗的合法性存在；而40年代《讲话》的发表，宣判了新诗主体性和现代性的死亡，钦定了新诗人民性和民族性的崇高地位，导致了新诗第二次革命的发生、发展；直至新时期，朦胧诗以反抗“文革诗歌”的蒙昧主义为使命，策动了新诗第三次革命，而且，其追求新诗的多样性风格、多元化价值和语言目的性的转变，波及第三代诗歌、90年代诗歌和21世纪初的新诗。这些广义的“后朦胧诗”与朦胧诗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联。尽管它们内部的确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新气象，但那都只不过是未来的第四次新诗革命所做的准备。因此，就目前情形而言，新诗仍然处在第三次变革中。新诗要突出重围，必须来一场新的革命。

此外，近年来，诗歌批评出现了许多了无生气的“学术化”文评和鼓噪性的印象式“酷评”，导致了批评之病。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诗歌批评。首先，应该检讨当前诗歌批评中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确立

诗歌批评是一种独特的科学活动的观念,并且要厘清诗歌批评的科学性及其个性之辩证表现。其次,还要认识到诗歌批评不仅要承担批评家的精神高度与个人使命,还要承担批评自身的责任;同时,要注重诗歌批评的真实性和美感享受等问题。最后,要重建诗歌批评的良好秩序与内在机制,重铸诗歌批评的民族性格。只有如此,当前诗歌批评才能迎来真正意义上的复兴。